

简评典型组讨论方法的应用

李冬莉

内容提要:使用典型组讨论方法可以用来收集定性资料。本文在介绍并讨论调查方法的定义、操作要求、有关技巧、方法的由来和发展、局限性和优势的基础上,以中国人口信息研究中心应用该方法调查农民的性别偏好的过程研究实例,简评此方法的优劣。

没有一种调查方法是适用于一切研究目标的。因此,必须根据研究的需要来确定最适当的资料收集方式。问卷方法本身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它的“缺憾在于提问的人处于居高临下的地位,也就是使调查对象或多或少地成为被动的角色。如果问卷没有把握住通向事实的方向,完全可能漏掉最重要的信息”(Rice, 1931);“……定量方法旨在站在局外者的立场用客观的眼光分析人们的处境和行为;而定性方法则致力于用一种局内人的主观视角理解人们的处境和行为……即试图从被研究者的角度理解价值、信仰、行动、观念等。”(Judi A ubel, 1994)。社会学的定性研究方法有多种:如参与观察法(Participant Observation)、深入访谈(In-depth Interviews)、个案研究(Case Studies)、文献分析(Literature Research)等。“近年来,典型组讨论调查法是其中被认为很有发展潜力的一种”(Hohn Knodel, 1995)。

中国人口信息研究中心在1993年和1996年在宁夏、广东、浙江进行的两次关于生育的家庭习俗的调查中,成功地应用了典型组讨论调查方法,其收集到的定性资料异常丰富,为认识传统的父权主义家庭制度对农民性别偏好的作用,以及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发展对农民性别偏好改变的影响提供了可贵的依据。

一、方法介绍

典型组专题讨论调查方法(Focus Group Discussion),作为社会学和人类学的调查方法之一,“是一种可为研究者提供独特的了解调查对象的思想 and 情感的方式,被认为具有非常宝贵的价值,近年来在社会科学研究中受到重视。”(Lettenmaier C., 1994)笔者最近在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人口信息中心出品的光盘“POPLINE SUPPORT”中用Focus Group Discussion关键词检索到文摘共418篇,其中原书刊出版于1980—1990年间的共191篇,而出版于1991—1995年间的有237篇,呈显著增加趋势。

这种方法的基本思路是:从特定的目标人群中挑选若干对象,以讨论会的形式,围绕研究者感兴趣的若干主题展开讨论。Focus在这里有双重涵义:典型组(Focus Group)的所有成员都具备某些与小组讨论题目有关的共同特征,也就是说,他们都具备某种典型性;小组讨论是严格限制在与研究有关的、相对狭窄的范围内的(Focused Discussion),该方法以此得名(Richard A., 1988)。每一组讨论通常由6—7个调查对象参加,外加1名受过方法训练的主持人(Moderator)、1名录音员、1名记录员,必要时还需要1—2名助手。主持人依据事先准备好的提纲提出开放性问题,引导与会人员展开讨论,并确保讨论内容不离开研究的需要。通常

除主持人以外的工作人员不介入讨论。讨论的全过程都要录音,并在会将录音资料逐字逐句整理成文字。这些调查提纲、录音磁带和整理出来的文字资料便构成了原始的调查资料,成为以后研究分析的依据。

从以上要求可以看出,使用典型组讨论调查方法必须严格地遵循特定的工作程序,一般的小组讨论是不能与这种基本的社会科学调查方法相混同的。使调查成功的关键在于主持人能否设法使讨论形成群体效应。有时通过调动出大胆外向的调查对象的讨论热情可以激发其他人,就形成了人人主动参与争相发言的气氛,为研究获得尽可能丰富的资料。这正像人口信息中心在宁夏调查的讨论记录中一个讨论组成员发言中的一句话:“本来不想说的,见大家说得火热,也就说几句。”讨论组成员之间的互动是难能可贵的。应当竭力避免出现一问一答、不问不说的局面。主持人的专业水平、人际沟通技巧,甚至其人格魅力都会影响到调查质量(Miriam Jato and Ariane, 1994; Khan and Ankar, 1991; Khan and Manderson, 1992)。

最早的关于典型组调查技术的描述出自鲍格杜斯(Bogardus, 1926)。当时的社会科学家们开始考虑如何使调查人员摆脱指导地位,以便让调查对象处在中心的位置上主动讲出他们认为重要,而被研究人员忽略的信息。到30年代和40年代,非指导性访谈开始受到社会学家和心理学家的高度重视。罗兹利施尔格尔(Roethlisberger)和迪克森(Dickson)在激励雇员的研究中,卡尔·罗杰斯(Carl Rogers)在心理学研究中使用了这种方法。二战期间,研究者开始越来越多地把典型组讨论用于部队士气研究。1956年,默顿(K. Merton)等人在总结前人经验的基础上,把已被普遍采用的典型组讨论的程序规范地总结出来,写入其经典性著作《有焦点的访谈》(The Focused Interview)中(K. Merton, 1956)。

60年代以后,随着微机的普及,定量研究方法和分析技术不断发展和完善。人们变得偏爱定量方法,似乎非数字不能反映现象的本质和社会趋势。这一潮流对分析水平的提高和研究能力的加强无疑具有极重要的意义。但是,后来研究者们又发现,数字并不是万能的,有些社会现象的复杂性不仅表现在定量化和操作化的困难,还表现在社会现象背后的心理的、文化的、伦理的、习俗等方面的因素往往是定量研究所不能企及的。于是,研究者又开始“重视发现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Judith Aubele, 1994),典型组讨论调查方法的价值被人们再次评价,并在实际调查中重新得到应用。

二、两个调查实例

1. 中国人口信息研究中心与联合国人口基金合作,于1993年11月在广东省四会县和宁夏回族自治区平罗县为“人口与发展综合项目”进行了实地典型组讨论专题调查。

为了介绍典型组讨论调查方法,联合国专家赫尔(Hull)专程到北京向调查队的研究人员进行了方法培训。在此之后,调查队赴北京郊区门头沟进行了试调查,旨在熟悉调查方法,检验调查提纲。

1993年9月,两个调查小分队分别奔赴宁夏和广东开始调查,调查分别历时11天和12天,调查主题为与妇女地位和生育有关的家庭习俗。赴宁夏平罗小分队在具有不同的社会特征的人群中组织了11个讨论会,包括:纯女户(只有女儿的家庭)组、婆婆组、女能人组、未婚大龄女青年组、妇女干部组、两个在外务工丈夫组、农村知识分子组(教师和医生)、村干部组、乡计划生育专干组、宗教人士组。赴广东四会小分队在讨论分组上比平罗少一个宗教人士组,多一个三资企业女工组。讨论会一般在两个半小时之内,使用两台录音机同时录音。为了保证调查质量,平罗和四会的讨论会的主持人、记录员和录音员全部由研究人员担任。由于方言的

障碍,四会的座谈会采取了双主持人的方式,由中国人口信息研究中心和广东人口信息研究中心的研究人员共同主持。在当地聘请两类助手,一类召集与会人员,另一类协助将录音整理成文字资料。

2 1996年3月中国人口信息研究中心与美国哈佛大学合作,进行了旨在三个亚洲国家间进行性别偏好比较研究的“中国农民生育文化调查”。中心派出调查小分队分两路到浙江省黄岩市郊区的台州区和海宁县同时进行实地典型组讨论调查,历时两个星期。调查主题为性别偏好—有关习俗—妇女地位。这次调查共组织了16个典型组,在黄岩和海宁各8个,分别在两地的四个处于不同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乡举行。每个乡分别组织老年男性组、老年女性组、已婚育龄妇女组、青年男性组四个讨论会。笔者参与了在海宁的调查全过程并主持了其中两个调查会。

在两个调查中,由于信息中心同事们的成功努力,讨论深入到与调查主题有关的方方面面,收集到的资料异常丰富。讨论记录中的许多发言给人一种绘声绘色的现场感,使研究者仿佛置身在讨论中,可以切身地感觉到调查对象的思想、态度,甚至细微的情感变化。

三、资料分析与调查报告写作

国外的一些典型组讨论调查的资料书上介绍过多种典型组讨论文字记录的分析方法,甚至还有研究者为此专门设计了计算机软件《Ethnograph》。笔者在撰写自己的文章时因条件所限,采用的是比较有把握掌握的、克鲁格尔(A. Krueger)在《Focus Group: A Practical Guide for Applied Research》一书中建议的方法:“通过反复阅读各讨论会的记录,努力寻找能反映出趋势和构架(Pattern)的线索。然后把自己的发现陈述出来。这些发现应当能多次被记录中的发言所支持,尽管发言的语言风格和用字不同。”“个别意见即便精彩,也不收入。”(Krueger, 1988)。

具体来说,克鲁格尔建议的典型组调查分析报告应包括三个部分:原始资料;描述性说明;解释(Raw data-Descriptive Statements-Interpretation)。对资料的分析应当覆盖讨论原始记录中的全部发言,研究报告只挑选并罗列最具典型意义和表达上最生动的发言是为了读者的方便。描述性说明是以挑选出来的发言为依据的,通常应当简洁而切中要点。解释部分提供的是原始资料的内在意义(Meaning),而不应当是资料中观点的总结(Summary)。在做解释工作时,分析者应参照讨论会记录中提供的所有证据,包括某种意见的出现频率、观点的强烈程度、发言者列举的例子等。此外,还应参考调查人员的现场工作笔记。

四、地区间比较

首先,必须谈一下典型组讨论记录这种定性资料的可比性问题。方法研究者通常把访谈分成结构式和无结构式两种。结构式访谈的特点是过程和调查结果的标准化的,但是无法对问题进行深入的探讨;无结构式的最大长处是弹性大,有利于适应千变万化的客观情况,但所获资料难以定量分析,结果不能普遍化,且费时较多。

约翰·诺戴(John Knodel)曾经把典型组专题讨论用于文化比较老年学研究(Cross-cultural Gerontology)。他把典型组调查得来的定性资料称为半结构式的资料(quasi-structured)。他认为,与经典的人类学的定性研究方法—参与观察法相比,典型组讨论与目标人口的接触是相对有限的,不需要深入到社区中去蹲点居住。此外,主持人用于指导不同人群讨论的提纲是统一拟订的,因而据此得到的调查结果是相对结构性的。若从传统的人类学研究的视角,这些特征会被视为缺陷。但脱离了这个角度,尤其是试图进行比较研究时,这些特征能够使定性资料的

收集工作变得易于操作,并在很大程度上增加了比较分析定性调查结果的可行性。

笔者把两次调查涉及的三个地区的原始资料进行比较研究,是出于如下考虑:

1. 两次调查虽然相隔三年,但与生育文化传统持续的悠悠数千载相比,不过是短短的一瞬,可以不予计较。

2. 两个调查虽然使用了不同的提纲,但共同指向了几乎是同一的调查目标。笔者在阅读原始资料时发现,三个地区的讨论记录都显示出传统家庭制度的三个特征父权、父系、父居,而且这些特征都与性别偏好密切相关。在父权主义家庭制度强的情况下,性别偏好亦强;而父权制度弱化的情况下,性别偏好也弱化了。于是决定在分析过程中放弃提纲,设计出以家族主义父权、父系、父居三个特征为主要内容的分析框架,以此作为统一的比较标准,把三个地区讨论记录中涉及到这三个特征的意见、态度和描述进行比较分析。

3. 通过反复阅读处于不同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宁夏、广东和浙江三个地区的原始资料,发现讨论记录显示出在宁夏、广东两个地区的调查范围内,父权、父系、父居,仍然被农民遵循,而浙江的调查资料显示出改革开放以来,由于当地经济高速发展,妇女的广泛就业使传统的家庭制度受到冲击,性别偏好弱化。这样一来,就获得了一个观察经济发展对妇女地位,从而对传统家庭制度的变迁和性别偏好弱化的影响之引人入胜的视角。

五、典型组讨论方法的局限性与优点的比较

局限性:

1. 讨论组成员少,又是经过有意挑选的,除了比较少数意见和多数意见外,不能用来做定量分析;虽然讨论意见在目标人群中或多或少具有典型性,但是不具备任何统计学意义上的代表性;

2. 调查质量甚至调查结果能否成立,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主持人的水平与技巧;

3. 与所有的定性研究相似,资料的收集过程和对调查结果的分析都很难避免主观性;

4. 讨论有可能被少数人垄断,有些调查对象可能附和他人而不谈真实的想法。

优点:

1. 因为不需要在调查社区中蹲点居住,相对于参与观察法,可以在短时间内,在大得多的范围中,获取丰富的定性资料;

2. 可以追踪事先无法预知的线索,热烈的讨论气氛可能激发出用个别访谈难以问出的意见;

3. 讨论组对误报和隐瞒有一定的抑制作用;

4. 调查周期短,只要把录音带整理成文字,调查结果就可以使用,在研究人员参与了调查的情况下更是如此;

5. 调查费用相对节省;

6. 调查的原始资料不仅能传达调查对象的观点态度,研究者从中还能读出活生生的人的生活故事并体验到人的情感。

笔者在做分析工作时对这最后一点很有体会,曾多次深深地被话语反映出的不同处境中的妇女心态所触动:她们或悲伤忧郁,或精神解放,或压抑愤懑,或心满意足。这无疑对研究者理解不同情境中妇女的实际地位大有裨益。在此列举两组例子仅供参考:

例一:妇女在家庭中的权利

主持人(以下略为“主”):“你现在家里边,两口子,做妻子的发言权多不多?”

任××：“一般在家大的事妻子管不着，小小的事嘛……经济方面的，好像是男的主事。女同志吧，你花几块钱行呢，花几百买个啥非得等丈夫回来才能就是。”（宁夏平罗县纯女户组记录第9页）

可见，在这个调查对象的家庭中仍然是男人掌握经济权力，妻子不能做重要的决定。然而她似乎是循规蹈矩，服从支配，没有怨言。

主：“你们的衣服是很高档的，耳朵上还戴着什么，买这些东西是很花钱的，你们有没有自由？”

赵：“肯定自由的。”（众笑）

主：“那么，高档家具、高档电器，家里谁说了算数？”

严：“商量，大家商量。”

主：“你爱人要去买摩托车，要你批准吗？”

王：“不用说要批准的。”（众笑）

主：“你男的要是赌，你限制他吗？”

赵：“肯定要限制他们的。”

王：“我们这地方，男的赌、喝酒要监视的，买东西不干涉的。赌全部要空的，但是东西总是家里的。像摩托车，钱也不少的，固定资产。赌的话，全没了。”（浙江海宁辛江乡育龄妇女组记录第5页）

很显然，妇女经济收入增加后改变了她们在家庭中的被支配地位。夫妻间权利平等，重要的家庭事务夫妻商量着办。妻子在经济开销方面有了相当大的决定权。就业妇女比务农妇女活动范围大，见识广，自信心强；由于在工作和社会活动中得到锻炼，她们形成了独立的意志和见解，从发言中能看出她们的精明能干。而男人手里钱多了行为容易放纵，妻子为维护家庭，就“妻管严”。这也说明妻子权利增加对家庭和社会的稳定应当是有积极影响的。相对于丈夫，总是妻子更多地从维护家庭整体利益考虑问题，说明“女主内”的传统分工还存在，但由于妻子权利的增加，分工的内容和形式有了变化。

例二：儿子偏好

主：“你们生了女孩是否有人看低你们？”

罗××：“很多看低自己。没有仔，有仔幸运。自己没仔认为很惭愧，个个都这样……”（广东四会纯女户记录第14页）

不难看出，舆论使这个只生女儿的妇女自觉低人一等，自卑心态跃然纸上。他人的歧视只能形成外界的压力，而她完全屈从于外界压力从而彻底地失去自信。妇女唯有靠生儿子才能提高地位，恰恰说明她们自身全无地位。

主：“我辛辛苦苦盖房子，为了传下去，千方百计要生一个儿子，有没有？”

王：“没有。”

众：“没有。”

主：“无所谓，传给谁无所谓。”

徐：“儿子女儿一样的。”

主：“没儿没女怎么办？”

众：“反正都进敬老院了。”

主：“他们一代都没什么财产。”

众：“对。”

主：“你们这一代怎么想呢？”

众：“我们不想。哈哈！”（海宁县辛江乡育龄妇女组第14页）

可以感到，这些年轻妇女已经彻底抛弃了传宗接代的传统意识，她们显然在用另一种哲学指导自己的生活了。

性别偏好，是指家庭里长辈对子女性别的偏好。笔者认为，性别偏好应分成两种：个人喜好与家庭制度决定的偏好。个人喜好如同吃饭的口味，是个人选择，没有好和不好；而我国绝大多数农村地区存在的极端的儿子偏好，是一种群体心理固结（fixation），属于家庭制度决定的性别偏好。它反映出父权主义家庭制度中妇女的无权地位，是性别歧视的表现，是落后的社会现象。研究农民性别偏好，必须观察、分析、理解有关的传统家庭制度，而这些家庭制度在现实中则表现为世代代被人们在家庭生活中因袭相沿的种种陈规陋习。

近代以来，我国大城市经历了政治革命、社会的主导价值重新取向、社会转型和重新分层、经济上的工业化以及改革开放等一次又一次的深刻变迁，使得人们传统的生活方式和家庭价值观发生了相当彻底的改变；而农村由于环境相对封闭和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局限，传统的惯性使封建时代遗留下来的许多家庭习俗，在很多地方，在很大程度上仍然被人们顽固地遵守。城乡差别是如此之大，以至于我们这些平时脱离、甚至可以说是隔绝于传统家庭文化的研究者们，很可能事先无法预知，甚至难于理解农民的家族主义；再加上家庭习俗，细微琐碎无处不在，却很可能随着时代发展而出现万花筒般的千变万化，且其中可能带着种种意想不到的感情因素和非理性动机，于是就很难在调查前凭借研究者的“现代观念”设计出理想的封闭式问卷。陈俊杰在他的硕士论文中就曾谈到他在越村调查农民的生育观时使用问卷走过的弯路（陈俊杰，1995）。此外，笔者以为有些针对农村家庭的定量调查套用西方家庭社会学的概念，如核心家庭、主干家庭等，实际上并不能恰当地涵盖我国传统的家庭组织形式，并有说服力地解释其特有的一些行为方式。

当代西方的后现代主义社会学重视对话语风格的分析（Discourse Analysis）。福柯认为，“权力关系存在于日常话语的风格上”，通过对其分析，“可以发现存在于知识和传统之中的、不平等的社会关系。”（Foucault, M., 1970）典型组讨论记录作为对研究对象话语逐字逐句的实录，是一种为研究者提供适用于话语风格研究的资料来源。

参考文献：

陈俊杰，1995年，“农民生育观念与生育的性别偏好——浙东越村的社会人类学调查”，中国人口信息研究中心编《中国出生性别比研究》，第111—116页。

Judi Aibel, 1994 ' Guidelines for Studies Using the Group Interview Technique', International Labour Office, Geneva, P. 3

Hohn Knodel, April, 1995 ' Focus Groups as a qualitative Method for Cross-Cultural Research in Social Gerontology', Journal of Cross-Cultural Gerontology. Vol. 10, No. 112, Dordrecht/ Boston/ London.

Richard A. Arueger, 1988 ' Focus Groups: A Practical Guide for Applied Research', Sage Publications London.

Miriam Jato, Ariane van der Straten, 1994, ' Using Focus group Discussions to Explore the Role of Women's in Family-Planning Information Dissemination in Yaounde Cameroon', Health Transition Review, Vol. 4, no. 1, U. S. A.

Bogardus E. M., 1926 The Group Interview, Journal of Applied Sociology 10: 372—82.

- Rice, S. A., 1931, 'Methods in Social Scienc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U. S. A.
- Roethlisberger F. J. Dickson W. J., 1938 'Management and the worker',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Roger, Carl R., 1942, Counseling and Psychotherapy, New York, Houghto Mifflin, U. S. A.
- Merton, Robert K., Fiske, Mrjorie, Kendall, Patricia L., 1956 'The Focused Interview', Glencoe, IL, Free Press.
- Khan, M. E., M. Anker, B. Pat, S. Bargø H. Sadhwani, and R. Kohle, 1991, 'The Use of Focus Groups In Social and Behavioral Research-Some Methodological Issues.', World Health Statistics Quarterly 44: 145-148.
- Khan, M. E., and L. Manderson, 1992, 'Focus Groups in Tropical Diseases Research', Health Policy and Planning 7 (1): 56-66.
- Focault, M., 1970 The order of Things New York, Pantheon.

作者系中国人口信息研究中心助理翻译
责任编辑:张宛丽

中国社会学会 1998 年年会征文通知

中国社会学会 1998 年年会定于 1998 年 5 月下旬在福建省福清市举行。现将有关论文征集事宜通知如下:

一、会议主题: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社会与社会学。撰写论文可围绕以下专题自行选择。1.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社会学分析;2. 当前中国农村的社会问题研究;3. 国有企业改革的社会学思考;4. 沿海地区的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5. 海外华人与中国社会发展;6. 海峡两岸合作与交流的社会学研究。

二、截稿日期:请于 1998 年 4 月 1 日前(以收件地邮戳为准)将论文和摘要(一式三份)寄福建省福州市五一中路状元巷 26 号(邮编:350005)福建省社会学学会秘书处。

联系电话:(0591)3334931, 传真:(0591)3312100, 联系人:林循熙。

三、年会除少数特邀代表外,均以文入会。报送的论文将由专家组审定,对入选作者寄发会议通知;对其中优秀者将在会上发奖。会议正式通知将于 4 月底发出。

四、本次年会将举行近 3 年来社会学科研成果展览,请作者将作品(论文、书刊等)一式二份,于 1998 年 4 月 1 日前寄给福建省福清市人民政府办公室黄华光、林云明同志(邮编:350300)。

中国社会学会
福清市委、市政府
福建省社会学学会